

Distant Strangers

How Britain Became Moder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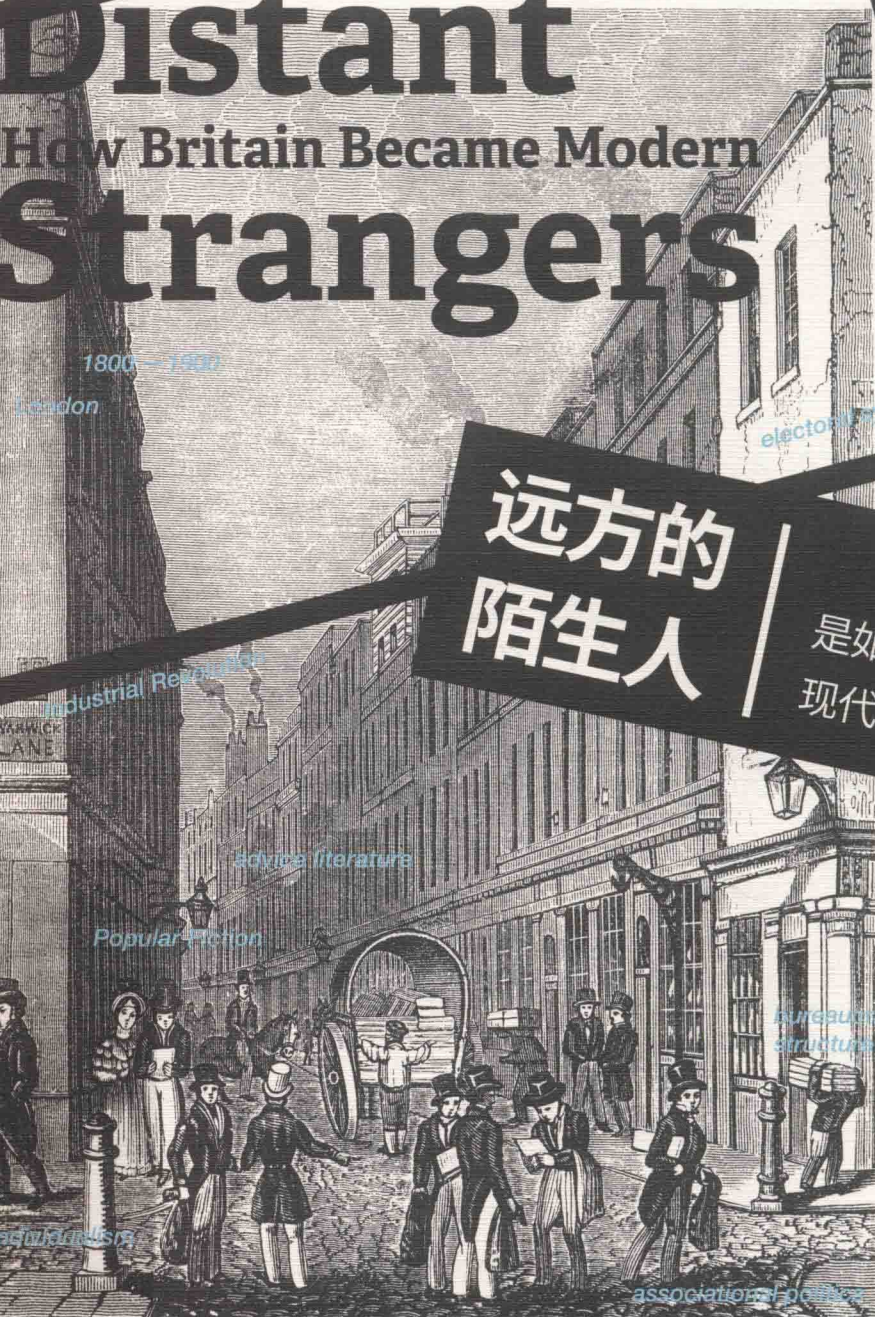
1800—1930

London

JAMES VERNON

远方的陌生人

英国
是如何成为
现代国家的



[美] 詹姆斯·弗农 著

张祝馨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Distant How Britain Became Modern Strangers

JAMES VERNON

远方的
陌生人

英国
是如何成为
现代国家的

[美] 詹姆斯·弗农——著

张祝馨——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 / (美)
詹姆斯·弗农 (James Vernon) 著；张祝馨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3438-5

I．①远… II．①詹… ②张… III．①英国—历史—
研究 IV．① K56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3728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

〔美〕詹姆斯·弗农 著

张祝馨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印 制
ISBN 978-7-100-13438-5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7.5

定价：45.00 元

目 录

插图目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什么是现代性? 011

第二章 陌生人社会 033

第三章 统治陌生人 075

第四章 与陌生人结盟 109

第五章 陌生人经济 141

结 论 177

注 释 185

索 引 217

插图目录

1. 人口增长率比较图	024
2. 城市人口百分比比较图	025
3. 人口密度比较图	026
4. 向利物浦、曼彻斯特、博尔顿的移民（1851年人口普查）	045
5. 付费公路枢纽的发展（1750年和1770年）	047 / 048
6. 公路—马车旅行的速度增长（1750年和1821年）	051
7. 铁路网络的发展（1840—1900年）	052
8. 铁路旅行时间和距离（1845年和1910年）	054
9.《伦敦的巴士生活》	063
10. 白厅的“庄严”空间	102

前言

本书讨论了过去三个世纪——甚至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中最伟大的历史转型。它试图解释我们是如何成为现代人的，并考察了会被称为“现代性”（**modernity**）的现代生活的特征。本书揭示了在 18 世纪中期到 19 世纪晚期这段时间内，出现在英国的全新的、现代的社会境况。英国人口的急剧扩增，及其在更广范围内日益增加的流动性，创造了一个充斥着陌生人的社会。这就引出了一系列关于如何管理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问题。权威、联盟、交易，这些植根于个人和本地关系的旧有关系模式渐渐变得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难以为继。另外，许多抽象的、官僚化的体制不断涌现，以支持远方的陌生人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从而逐渐替代了那些旧式机关。然而，这并未导致人们对现代世界期待的幻灭，因为这些代表了官僚主义抽象化的新体制，因个人和本地关系的衰

落而兴起，却也促进了后者的复苏。因而，现代境况不仅仅是一种在陌生人社会中的全新生活体验，还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权威、联盟、交易这些旧模式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重塑。

我们有理由认为，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经历这种转型，并进入现代化的国家。然而，相比英国是否是第一个现代社会，或是否创造了现代世界（如数不胜数的书籍和大学课程所指出的），我更感兴趣的问题是，此种意义上的现代性是否也适用于其他社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历史学家们渐渐认识到，每个社会都能以其独有的方式成为现代社会；现代性经验的数量和种类是无限的。我的观点是：这种解释会使“现代性”这个术语失去意义或分析上的用途。因此，本书的真正目的，以及本书可能会吸引那些对英国毫无兴趣的读者之原因，是证明如下论点：如果想要“现代性”这个范畴仍有分析上的意义，就必须找到所有社会都会经历的那种特有的情境或过程，即便其形式可能多种多样。

这个论点非常小众，因此我必须从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开始解释。过去一个世代以来，历史学家们费尽心思，一再强调如今发生的事件已越来越少，他们试图通过这种做法让过去的历史看上去更有趣一些。可以肯定的是，通过将全球的事件，将更多的人、动物甚至是物体纳入历史，我们已使其变得更民主了，但我们对历史变迁愈加复杂化的解释，容易赋予历史一种平静的必然性。在对待欧洲史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从 19 世纪晚期开始，为了解释欧洲

的过去，历史学分支下的现代学科兴起，对现代世界的构成（在美国或被称为西方文明的崛起）做了一次清晰的叙述。叙述包含了一系列有着奠基和转型作用的事件，如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及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崛起。史家渐渐对这个叙述产生怀疑，并开始注意到那些被排斥在外的欧洲民族，以及历史上其他文明对此的完全不同的解释。在这个过程中，史家修正了这段叙述。他们相信，所有曾经被认为具有奠基意义的事件，其实都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他们开始认为，在社会进程中，这些事件并不那么具有转型意义，它们只是几个世纪以来漫长却不均衡的转变过程和逐渐扩张的地理版图所造成的后果。过去对不断发生的革命性激烈转型的历史叙述，如今要让位给一个充满了连续性和不确定性的相对平淡的历史。

作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地，在后一种“平淡的”历史阶段，英国通常都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成为历史编纂的重要阵地。这个势头在 20 世纪 30 年代逐渐显露：塞拉（W. C. Sellar）和伊特曼（R. J. Yeatman）在《1066 及一切》（*1066 and All That*）中戏仿了学校中教授的胜利主义“鼓吹式”（drums and trumpet）英国史；克莱彭（J. H. Clapham）在其巨著《现代英国经济史》（*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中探索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节奏和规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现代化理论开始力捧英国的快速工业化与其政治及社会稳定的完美结合，又掀起了一股编史的风潮。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很少有史家接受这种观点，他们都倾向于强调，

在根深蒂固的旧制度（*ancien regime*）和长期（*long duree*）的经济转型面前，英国产生了许多社会及政治冲突。社会变化的“大爆炸”模型逐渐让位给长久的、不齐整的哀诉。对于一些人而言，英国不仅没有创造现代世界，而且从来都不曾成为现代国家。

很显然，这些说法的背后都有其政治意图。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之间，人们在不同的领域使用“衰落”的比喻，以此来解释英帝国的败亡。英国的“衰退”可指涉：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环境下其经济地位的重置；伴随着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民族主义的崛起，在这片种族和宗教日益多样化的国土上，多元文化主义的兴盛，及其民族国家的分崩离析；其道德和工业秩序的瓦解。那些修正主义学派的历史叙述弱化了英国在现代世界构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对此，右翼政客，不仅仅是那些后来助长了撒切尔主义崛起的人，认为这是衰落主义（*declinism*）文化的一部分，如果英国想要再次强盛起来，就必须抑制此观点的蔓延。1988 年，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二度执政期间，英国学校的历史授课开始采用新的全国统一课程，于是这场争论便在偏左翼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和想要恢复英国及其历史往昔荣光的右翼政客之间展开了。而当保守派领导的政府再一次承诺，要改善学生在毕业时仍对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历史一无所知的状况——教育部部长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称这历史为“最鼓舞人心的故事之一”——这场争论又被再次激发了。迈克尔·戈夫坚信那些在中小学和大学教授历史的教师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立场，但希望国家的

叙事性历史能够回归（不过不需要那么多鼓吹的内容了），于是他聘请了一些常常出现在电视节目中的历史学家，让他们编写一套新的课程，此举招来了历史学家们的强烈抨击。

而在大西洋的另一端，对英国史之衰落的忧虑正以另一种方式呈现。1998年，北美英国研究会（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British Studies）委托其最优秀的英国史学者评估他们领域的现状。第二年，一份所谓的“斯坦斯基报告”（Stansky Report）出炉了，这份报告相当令人沮丧。报告花了大量篇幅复述传闻，而真实的数据却很少。文章哀叹了英国史在各个层面都被边缘化的命运——本科生对该学科的兴趣日趋减少，研究生的资助项目和工作岗位严重不足，该学科论文发表于主流学术期刊和出版物的机会也渐渐减少。在这种解读下，英国史成了美国和加拿大学界之间文化战争的受害者，该战争给英国史贴上了“死去的白人男性”（Dead White Men, DWM）* 的标签，还鼓动各院校历史系将他们的英国史学者替换为其他国家史学的研究者。斯坦斯基报告对此境遇提出的解决方法是，让英国历史学家做一次帝国主义式的转身，即承认英帝国的蔓延性和爆炸性是存在的。这就是目前在美国，该领域的正统观点。美国在介入曾经的英国殖民地时逐渐踏入了英帝国的阴影之

* “死去的白人男性”，指历来是历史和西方文化学术研究的重点的已逝白人男性，也用于批判将较为古老的欧洲历史和意识形态视为重要于其他文化的价值观。——译者注（本书脚注如无另做说明，均为译者注）

中，而此时帝国主义英国的历史却引发了新的共鸣。忽然之间，不论你是拥护者还是批判者（的确有拥护者认为美国可以效仿英国的帝国主义！），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帝国主义强权的兴衰起落都变得异常重要，重要得令人费解。

xv

面对这种对恢复胜利主义国家叙事和宣扬英帝国在现代世界构成中之助益的呼声，大多数英国史学者开始不知所措。毫无疑问，过去的两代学者都没有告诉过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触目惊心的主张。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兴起引得人们去关注微观史学所呈现出的深度描述，这使得（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史家对这种宏大叙事的野心和对历史变化的宏观解析十分反感——尽管这种解释法曾深深吸引了前一代历史学家。与此同时，历史学细分为专业性更强的分支学科（按研究主体、年代顺序和研究方法划分），尽管行政任务和学生数量与日俱增，高校院系的重组仍要求我们必须发表更多的论文，这使得学术工作的本质发生了转变。这二者的同时发生绝不是巧合。渐渐地，我们历史学者的研究只能是不断“炒冷饭”，高校的行政部门和政客因而开始质疑我们学科的价值。在英国，本应拨款给高校历史教学的公共基金，也和人文艺术及社科学科的资助一样被完全叫停，有些学校甚至彻底关闭了历史系。

因此，于我而言，重新审视“向现代性的转型”这样的历史问题，似乎是证明历史研究工作仍具有公共价值的一种适时的方法。重拾我们对从宏观角度解析历史变化的信心，能使公众更好地

了解过去以及我们的现在。在这方面，我不是一个人在努力，还有很多不同的途径。“大历史”“世界史”或“全球史”这些较新的学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历史学科的时间和地理维度及其注释范围。只不过，这些领域之学者的方法是提出智力和制度层面的问题，比如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模糊特定国家历史之间的界限，他们教授历史的能力，以及他们使用母语做研究的能力。如果世界史或大历史学者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何必去雇用中国史、印度史、巴西史、俄罗斯史的学者呢？更别说那些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early modern history**）和现代史学者了。的确，于比尔·盖茨——大历史学科的重要资助者，线上教学的推广者——而言，一个教授历史的“慕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就足够了！

在这种大环境下，我的努力似乎微不足道。因为要试图解释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我必须重新审视那个不断困扰着历史学家的问题，即现代世界与古代、中世纪以及近代世界有何不同？历史是一个串联起这些时代的学科，如果我们连现代的独特性、我们是如何抵达现代的、全球人民为何能共享现代性经验这些问题都无法解释，那么政客、高校行政部门、学生以及公众会对我们的研究丧失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在这本书中对现代的解释方法显然带有妥协和冒险的成分。大问题不仅会引来争论，还总是需要作者去探索自己不甚熟悉的领域。本书绝对不是一部研究专著，而更接近一篇长文，或是一系列

的讲座。总会有人觉得那种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综述型解释文本很无趣，尽管读之前他们可能没意识到。我在引用他人的作品时会尽力声明，但我也努力使注脚减到最少。我只希望本书好读、有趣，尽管它可能会让那些企图在其中寻找考试资料或新研究方向的人失望。

最后，按照惯例是对帮助过我写作此书的人们表示感谢。二十年来，我都在与才华横溢的研究生们相处，这是何其幸运。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在本书中发现自己研究的痕迹以及我们在课堂内外的对话内容。梅隆资助项目（**Mellon-funded program**）让伯克利、芝加哥、耶鲁和得克萨斯大学的学生与教师得以就英国向现代转型的本质和时机展开辩论，这是十分振奋人心的，尤其是因为史蒂夫·平卡斯（**Steve Pincus**）在和我一起主持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贡献出了许多精彩的辩论。潘妮·埃斯梅（**Penny Ismay**）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本书的合著者，长久以来，我们二人都在为“现代的历史应该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忧虑。特雷弗·杰克森（**Trevor Jackson**）不仅帮我取得了准确的人口学数据，还帮助我写下了结语。我在此还要对所有读过此书早期草稿，并助我润色文稿的人表达由衷的感谢：戴维·埃涅斯特（**David Anixter**）、玛丽·伊丽莎白·贝利（**Mary Elizabeth Berry**）、维纳斯·比瓦尔（**Venus Bivar**）、保罗·杜吉德（**Paul Duguid**）、戴斯蒙德·菲茨吉本（**Desmond FitzGibbon**）、格雷厄姆·佛曼（**Grahame Foreman**）、约翰·吉利斯（**John Gillis**）、潘妮·埃斯

梅 (Penny Ismay)、帕特里克·乔伊斯 (Patrick Joyce)、赛斯·柯文 (Seth Koven)、托马斯·拉奎尔 (Thomas Laqueur)、琼·劳伦斯 (Jon Lawrence)、托马斯·麦卡夫 (Thomas Metcalf)、克里斯·奥特 (Chris Otter)、彼得·萨林斯 (Peter Sahllins)、泰拉·萨森 (Tehila Sasson)、普莱亚·萨迪亚 (Priya Satia)、尤里·斯莱兹坎 (Yuri Slezkine)、兰迪·斯当 (Randy Starn)、简·德·弗莱 (Jan de Vries)、戴维·文森特 (David Vincent)、丹尼尔·乌西施金 (Daniel Ussishkin) 以及叶文心。我也感激 2011 年曼彻斯特社会史社团会议、2012 年春范德堡大学历史论坛、2013 春伯克利大学历史学院座谈会的所有与会人员，感谢他们的批评和提问。2011 年秋天，康拉德·雷瑟 (Conrad Leyser) 和 马特·霍尔布鲁克 (Matt · Houlbrook) 在牛津组织的讲座和工作坊非常有趣，我在那里收获颇丰。尼尔斯·胡珀 (Niels Hooper) 为他人之不敢为，让我重拾了对学术出版的信心。金·霍奇兰 (Kim Hogeland) 和 弗朗西斯科·莱金 (Francisco Reinking) 带领我进入出版业。潘·苏文斯基 (Pam Suwinsky) 为润色我粗糙的文笔做了极大的努力。尼克·卡达基 (Nick Kardahji) 为本书整理了索引。

这本书是在动荡的时代中写就的。在金融家们将这个世界引向毁灭之时，我的家庭一直在应付我们自己的危机，我的至亲至爱们彼此依靠，携手共渡难关。在整个过程中，我的姐妹克莱尔和宾妮就是我们家庭的支柱。她们的丈夫以及一大群的孩子（现在都已经成年了！），当然，还有我的母亲斯黛拉，都为这个家做了许多。也

正因有了罗斯和我们的孩子杰克、米莎以及阿尔夫，一切才成为可能。他们和他们的爱是我坚持写作的动力。这句话是为你写的，阿尔夫，我很高兴你在我们身边（迟到总比不来好），尽管你总是站错队。

第一章

什么是现代性？

